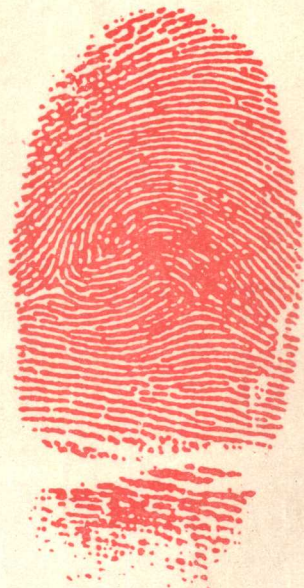


陈国凯

好人阿通

花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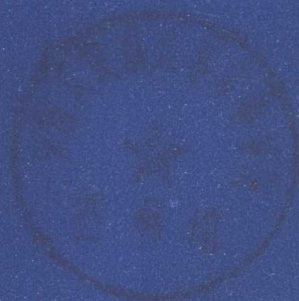


2 034 3603 1

第一部 从乡村到城市

好人所通

花城出版社





2 034 3603 1

好人阿通

陈国凯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插页 130,000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2,000册

书号 10261·459 定价 0.99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计划创作的多卷本小说的第一部，也是作者刻意创新之作。作品以颇为幽默的笔法，塑造了一个“好人”阿通的形象。这个阿通在风浪迭起的年代里充满了喜剧色彩，但也不无悲剧的哀音。作品通过阿通命运的升降沉浮，揭示了现实生活中某类人物的精神特质，展现了令人深长思之的社会生活的斑斓图景。

第一部以“大跃进”为背景，主要写了青年农民阿通在大炼钢铁及个人爱情生活中的种种行状。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目 录

题 叙.....	1
第 一 章 阿通的命名.....	17
第 二 章 铜锣与爱情.....	26
第 三 章 “阿哥好比番薯苗”.....	48
第 四 章 诱惑.....	56
第 五 章 阿通论共产主义社会.....	68
第 六 章 时势造英雄.....	76
第 七 章 大开眼界.....	89
第 八 章 砸锅	108
第 九 章 英雄抬轿	117
第 十 章 终身大事	184
第十一章 阿通三“滚”	146
第十二章 人海升沉	159
第十三章 神仙弟子的辛酸史	175
第十四章 临危不乱	195
第十五章 人间一席酒	218
第十六章 第二次抬轿	282
第十七章 出走	247
第十八章 指南针和方向盘	262
后 记	295

题 叙

在我们这个多事的世界上，生活着一个叫阿通的好人。说他好，当然是相对而言。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既然连“绝对真理”、“绝对权威”都是谬误的，那么，我们的阿通也只能是相对的好人了。笔者之所以要开宗明义地郑重声明这一点，是为了避免将来有人要给阿通贴标签。恕我直言，中国这些年来的文坛上有贴标签的坏习惯。而任何标签对阿通都是不太合适的。阿通就是阿通，这是毫无疑义的。

阿通是中国的名字，当然也就属于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了。这个道理，本来就象 $1 + 1 = 2$ 那么简单明了，那么通俗易懂。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阿通是不是中国人也受到怀疑。因为阿通的生理上有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他的头发不一般化。不知读者诸君研究过没有，一般中国人的头发是柔软的、平铺直叙的、非常可爱的。但是阿通的头发与众不同，是天生的波浪式而且有点卷曲。这一点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也给他招来了很大的麻烦。当阿通从造反战士变为“牛栏”里的“牛”之后，有“考证癖”的专案人员从阿通的头发上入手，想从这里打开阶级斗争的突破口。他们十分认真、十分仔细地考证和审查过阿通的头发，怀疑阿通和外国

人有无血缘关系，可否构成“特嫌”或“里通外国”的证据。但是，查来查去，使专案人员大为失望：阿通不但是纯种的中国人，而且思想也纯，他那恰如其分地长在四方脸盘上的无可挑剔的中国式鼻子，就毋庸置疑地证明他是轩辕皇帝的后代。总而言之，阿通纯粹是中国货。

至于阿通为什么生着那种不正统的头发？在“文化大革命”中，翻遍阿通的档案，查遍阿通的检查交代材料，都找不到答案。不但专案人员没法下结论，恐怕连阿通本人也不明白其所以然。过去人们问他，他只是理直气壮地说：

“爹妈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改得了么？你要怎么样？”

如果人们取笑他，他就会愤怒地说：

“我的头发碍你什么事啦？你妈个×！”

尽管人们怀疑了多少年，考证了多少年，阿通的头发为何不一般化、大众化的问题依然是一个悬案。史无前例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搞了十年，连阿通的头发都没有搞清楚，这是可悲的，也是可叹的。

阿通是个工人。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是宪法大典上明文记载着的。阿通当然是属于这光荣的领导阶级的光荣的一员了。可是阿通自己并没有体会到这种光荣和重大责任。他连自己的思想都领导不了。他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位可爱的同胞和我们可敬的作家们有共同之处。据说，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们大都是有点神经质的人——容易兴奋激动。阿通一兴奋起来，思想就要出轨，一出轨就要出乱子，一出乱子就要给自己找麻

烦。最糟糕的是他只属于“阶级”而不属于“领导”，也就是说他没有和“长”字挂上钩。如果阿通当了官，成了什么“长”，恐怕麻烦事要少一些。生活中不是有一些“永远正确”的官儿么，这种人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正确的。真理永远掌握在这少数人手里，没有什么麻烦。就是出了麻烦也可以凭借手上的权力巧妙地把麻烦一推，自己心安理得，高枕无忧，半点麻烦都没有。但是阿通没有这个权力，他只能制造麻烦，或者替别人分担麻烦，也就是说，他只能领导麻烦。

阿通是善良的、勤劳的、勇敢的。有时挺精明，有时很愚蠢。他具有一般中国人的很多美德，也有着中国人特有的一些缺点。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完人，只有蠢才才认为自己是完人，阿通决不承认自己是蠢才。但是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缺点。他在任何场合都是理直气壮、昂首阔步——不论他当农民还是工人，也不论他当造反战士还是当“牛栏”里的“牛”，他都是这个样子。他身体很好，消化功能十分正常，从来没有知识分子那种“思想复杂症”，不会神经衰弱，不会消化不良，也没有生过痔疮，更不知失眠为何物。他想睡马上就能睡着，和你讲着话他也会对着你打呼噜——如果他觉得听你讲话不如睡觉舒服的话。连专案人员对他训话时他都能睡着。平常开大会时，阿通喜欢坐在前面，因为坐在前面显得自己重要。但是台上的人在不断讲话，他就在台下不断“点头”。他“点头”是由于脑子处于睡眠状态时，颈部的肌肉一张一弛，形成了这样的自然节奏。由于阿通性格上和生理上具有这些美德或缺点，所以阿通很少有什

么病。他的体重在高峰时达到一百四十斤，低峰时也不下于一百二十斤。他宽肩广额，鼻扁嘴宽，时常笑嘻嘻地。看上去很有福相。如果他不死，有得活哩。不幸的是，后来我听说阿通被弄回乡下去之后，死了。但是，我对这个传说一直是将信将疑。因为阿通这样的人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去见上帝的。我决不是说阿通是个不朽的人物，但是阿通还没有达到他该死的年龄，到现在他才四十多岁，不论从他的体魄、健康、精神、气质、德行、品格、处事、为人看来，阿通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还要活很长的时间，你就是不想他活也不行。总而言之，阿通还没到他该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理由这么早死。因此，我对这个传说一直持怀疑态度。有一次，一个偶然的机，我问一位专案人员：

“×同志，阿通是不是真的死了？”

他似乎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闪烁其词地说：

“听说——阿通是死了。”

这“听说”两字，很值得推敲。虽然在那昏乱的年头，我们许多可爱的专案人员往往靠“听说”这两个字和一面之词去抓人打人、定人重罪或置人于死地，但是现在经过拨乱反正，靠“听说”来决定阿通的生或死，就说不过去了。再说，在十年浩劫中，死去活来的人多的是，生与死的概念搞得相当混乱。我总这样固执地认为：阿通没有死。说不定他哪天又突然笑嘻嘻地出现在我面前，怀着十分亲切的善意，笑嘻嘻地对我说：

“老丁，妈你个×，你还活着哪？还在写什么鸡巴毛，你

不怕死？”

如此这般地亲切地开导我一番——因为阿通喜欢开导人。他的开导既不能使人心悦诚服，也不会使人啼笑皆非，他对人总是善意多于恶意。

但是，关于阿通死了的消息，不知为何在厂里广泛传开了，人们一时间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啊！阿通死了！啊，啊……”

这包罗万象的“啊”声，使人猜不出是悲还是喜。那些年，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于用这不置可否的“啊”作为表态的方式。阿通如果真的死了，他在天有灵，知道他之死，只能得到这个模棱两可的“啊”字和几个极为平常的感叹号，他也会深深感到悲哀的——假如他有悲哀的话。

我和阿通是好友，这个“好”，也是相对而言。只是区别于我十分憎恶的那些人，例如林彪、“四人帮”和他们的帮子帮孙、流氓恶棍、学阀文痞……之类的货色。我虽然很早就认识阿通了，但我和他的工种职务不同，工厂里隔行如隔山，我们算不上深交。是“文化大革命”一声炮响，才把我们轰到一起的。那时候，我们虽然朝夕相处，但身份不同：我是“牛鬼蛇神”，他是看守我们这些“牛鬼蛇神”的“看牛郎”，拿着红白两色的水火棍监督我们劳动。后来我离开“牛栏”，升格为人，阿通已荣升为“造反司令”牛祥的忠实保镖，在武斗中他是打头阵的人物，听说还救过“造反司令”的命。“造反司令”成为省委副主任时，人们都以为阿通也要发迹了，要成为重要人物了。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我再次被关进“牛

栏”不久，阿通却莫名其妙地从上升的阶梯上骨碌碌地滚了下来，跌进“牛栏”，成为我们的“牛友”——被专政的对象。我之说他好，或者说引以为友，是因为他看管我们的时候，没有那么坏。他是绝对忠于职守的。经常警告我们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们每天对着领袖像履行“请罪”的礼拜仪式时，他都十分严格地检阅我们弯腰是否弯到恰当的弧度，并随时加以纠正。但是阿通从来不轻易打人骂人，有时甚至还和我们这些“牛”们讲几句笑话。有一次，他让我在“早请罪”时背诵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这段“最高指示”后，却笑口吟吟地对我做“启蒙工作”：

“你呀，真笨擦，既然你知道有人发明小说这玩意是用来自反党的，你还写这些鸡巴毛小说干嘛？你呀！捉虫入屁股——自找麻烦。你看我，我就不写小说——砍我的头也不写！凡是反党的东西我是坚决不干，坚决反对的！我连小说都不看，所以我问心无愧，我吃得好睡得香，‘一觉睡到日西斜’……”他快活地唱起“样板戏唱段”来了。京调粤腔，唱得十分别扭，但是阿通唱得十分得意。唱完之后，又顺手把吃剩的一个馒头送给了我，并郑重地叮嘱我：要多活几年就千万别再去写小说了。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阿通对我们这些“牛”们还是有恻隐之心的。那年头，能对我说几句真心话的人我就认为是好人，阿通好，就好在这里。

后来，阿通落魄倒霉，成为我们的“牛友”时，他那无忧无虑的性格使我们很和他合得来。他憨直忠厚的个性、微笑着的尊容和他说话时的腔调，很能解除生活在“牛栏”里的人

们的深深的寂寞。由于我和他关在同一个“栏”里，我们就很自然地成了朋友。他把他一生的经历和值得缅怀的往事都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了。他的检查交代材料写来写去只有两页纸。有一次他上厕所时，还稀里糊涂地把这两页纸抹了屁股，结果只好重写，写些什么他又记不清了，弄得他很伤了一番脑筋，而到他被遣送回乡，他这份短短两页纸的检查材料还没有写完。尽管他对写东西——特别是写检查交代材料——很不感兴趣，写得超乎其短，但是 he 和我谈的情况却可以写成一本书。阿通之所以能和我置腹交谈，一是由于他有爱说话的习惯，他不说话就简直活不下去。二是他认为我不是“混帐东西”——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而我也认为阿通不是“混帐东西”。我是“阿通的好友”之谓，就由此得来。

到了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倒台两年之后。阿通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他似乎被忙碌的世人遗忘了。落实政策、平反冤案似乎都没有阿通的份儿——至少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由于阿通没有结婚，没有家眷，因此没有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或者上诉人民法院要求为阿通落实政策，下个结论。如果阿通真的死了，自然不会写信告状。如果他不死，他向来也懒得写信的，好象 he 从来就没有收到过谁的信。阿通象堕落在喧嚣的尘世间的一粒灰尘，来得渺小，去的渺然。不过，我曾经是和阿通共过患难的“牛友”，他的音容笑貌、所言所行，都在我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象。有时想到阿通，就觉得心里头有鬼似地。我一直想为阿通写点什么，不论阿通死了没有，也说明人世间还有我这渺

小的人没有将这位渺小的同胞忘记，同时也希望我们这些健忘的同辈人，从阿通的荣辱升沉的遭遇中去思索一些东西。但是，想来想去，又觉得很难动笔。之所以难，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阿通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恐怕连“中间人物”都够不上。要写他，从文体上就很费踌躇，写传当然不行，因为他不是国家要人，不是将军或者省委书记，也不是学界名流或文坛巨子。从报刊杂志中是绝对找不到阿通的名字的。由此足以证明阿通是不可经传的人物。他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又没有令人崇拜的雄才大略或者救世匡民的仁纲德政。他只是个无足轻重、何足道哉的小人物，当然不能入传。如果不信，你写个《阿通传》或者《张三传》、《李四传》送到编辑部去试试。编辑同志准会以为作者发了神经病，毫不留情地把稿子丢到字纸篓里去。写一篇新闻报道吧，阿通又不是新闻人物，他的事迹太平凡了。我从来没有听说阿通搞过什么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也没有听说他在台风到来之前冒风斗雨去抢救水泥，或者洪水上涨时用身体去堵决口这类催人泪下的英勇行为。当然，说阿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也是不对的。在大炼钢铁时他连续苦战过五十两个小时，放过“卫星”；有一次大街上一群人和流氓打架时，他奋不顾身地投身进去干了一场，他是完全出于正义感的，但是结果发现他打错了人，把好人当作流氓来打了，终于被抓到派出所去教育了一番才放了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阿通也是作出了贡献的，为了“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他成为煮浆糊的一等好

手。在武斗时，为了捍卫“革命路线”，他几乎被流弹打穿了屁股，表现出十分坚定的“革命坚定性”。阿通也不是不爱学习的人，虽然他宣称他不看“鸡巴毛小说”，但是他读过“老三篇”，背得出十五——二十条“语录”（精确的数字待考）。在清理他的抄架（因为阿通没有家，只在集体宿舍占了一张架子床，所以只能叫抄架）物资时，还发现他有一本“活学活用”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满了他的“学习心得”。不过，他那些“学习心得”，我实在不敢恭维：其思想之混乱、内容之矛盾、词义之不清、文字之拙劣以及“最”字之多，达到“顶峰”的程度。虽然这类东西过去曾经风靡一时，成为不少人升官发财的捷径，但是如果把他的笔记拿来发表，也准是谬种流传，贻误后世。阿通的优点还很多，譬如他上下班准时，干活肯卖力气；他对公家的财产还是爱护的，没有把架子床上的床板拿来做法柜，没有用公家的钢管做鸟枪，甚至他还抓过一个小偷，等等。但是阿通又有不可原谅的劣迹：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伙同一些人偷过农民兄弟的番薯，几乎酝酿成一场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大战，在轰轰烈烈的破“四旧”中，他剪过女同志那不合乎“革命尺寸”的裤脚，使得有些女同志哭得象泪人儿似地。他还有个不可原谅的劣迹，在图书馆的报纸堆里拉过屎，在书堆里撒过尿，这种连暴君秦始皇都干不出来的事，阿通干出来了。这有辱斯文的人物，不属于新闻学的范畴，就是最老练、最有良心的新闻记者也难将阿通的生平事迹撮成一篇新闻报道。

要不，把阿通写成小说中的人物吧，但是阿通既不是

四化闯将，又不是当代英豪，也不是流行小说中的时髦青年或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这样的人物值不值得写成小说，我深表怀疑，因此，要写阿通，就确乎其难了。此其一。

第二，阿通的成份很难确定。纵使文学作品允许写阿通这样的人物，但是过去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首先要讲人物的阶级根源的。又往往把阶级根源和阶级出身之间划上等号。如果阿通是地、富、反、坏、右，或者是叛徒、特务，这好办，把阿通写成反面人物就可以了；如果阿通家庭出身很好，那也好办，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就行了。我们不少文学作品常常是按照“血统论”来塑造人物的。这样做，当然是既保险又正确。但是涉及到阿通这样的人，就很成问题。他的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都相当复杂。关于他的家庭出身，专案组的人员曾经花了大量的外调经费穿州过县，查过他的祖宗八代，发现他的第八代祖宗在清朝或明朝（历史知识十分有限的专案人员弄不清哪个朝代）中过举人，这确定无疑是封建地主阶级了。按照这一点去追溯阿通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可以把阿通定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但这似乎又不大恰当，因为阿通的曾祖父或曾曾祖父都是贫穷的工匠，改变了乃祖乃宗的成份。到了阿通的祖父，成份又变了，他是晚清时的老秀才，这似乎可以划为剥削阶级。但是一查又不妥，因为阿通的祖父是以教馆为生而且还经常要饿肚子的寒儒——俗称穷秀才。当然，根据“阶级斗争”需要，也勉强可以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另册，列为“老九”。但是到了阿通的父亲，成份又变了，成了自耕

农。顶多算个上中农。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根据解放前三年的经济收入定成份的政策，阿通父亲的成份更加复杂。这三年期间，他当过狱卒，可以当作历史反革命；后来又当了铁匠，成了工人阶级；又开过小商店，搞过民族资产，尔后破产回家典房卖地当了雇农。直到解放那年得病寿终正寝。阿通的父亲属什么成份，似乎谁也搞不清楚，阿通自己也弄不明白。他的家庭出身也随着他的政治处境变来变去，没个定准。“文化大革命”中，当他还是革命造反战士时，他的出身是工人阶级或者雇农，到他倒霉进“牛栏”时，他的出身成份就变成资本家的“狗崽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孝子贤孙。所以阿通的家庭出身是颇难弄清的。

至于阿通本人的成份，也很难搞清楚。解放前三年，他读过一年小学，又跟着他爸爸在铁匠铺拉过风箱，当了小学徒，后来又在村里当放牛郎。因此在“本人成份”这一栏里，他有时写“学生”，有时写“工人”，有时写“贫农”。随他高兴怎么写就怎么写，也没人干涉他。解放之后，他当了工人——确确实实的工人，这无疑是工人阶级了。但是后来他又糊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戴着这顶“帽子”回乡下去了。后来也没有听说谁给他摘过帽子，所以他究竟是属于工人阶级还是反动阶级，没有定论。对他的所言所行，也就难于找出他的阶级根源，写这样的人物，很容易被某些屁股后面老藏着棍子的评论家扣上丑化工人阶级或美化反动阶级的大帽子。所以，阿通这个人物很难写。

第三，关于阿通的去向问题，目前尚成悬案。据说，把阿

通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又成为落实政策办公室干部的那位办案人员，一九七八年到某地出差时，曾经顺道到过阿通那偏僻的山村，调查过阿通的情况。结果找不到阿通，村里人也说不清阿通是死是活，只说：阿通被押解回乡不久，就不知去向。也可能活着，也可能死了。办案人员为了不把事情弄得过于复杂，就在阿通的积案上写上一条：“据调查，此人已死。”人一死，自然一了百了。案子顺利了结。这也是提高办事效率的一个绝妙办法。

就假定按照办案人员的结论，说阿通死了，但写起来也很成问题。如果阿通是在“牛栏”里英勇斗争，被残酷迫害致死；或者在“四害”横行时，他就上书中央，独具慧眼地看出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给予揭露痛斥而身陷囹圄、英勇牺牲；或者在天安门事件中他曾振臂高呼，愤怒地声讨江青、张春桥这类乱臣贼子的滔天罪行，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砸得粉身碎骨，这都好写，把阿通写成一位大义凛然、英勇地与林彪、“四人帮”这群妖魔鬼怪进行斗争的英雄人物就行了。在那年头，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确实有不少这样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勇斗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披肝沥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象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英雄人物，将永远载入光荣的史册。但是，我们的阿通却不是这样的人物。他在“牛栏”里虽然日子不好过，但他似乎没有受过特别残酷的迫害，也谈不上什么英勇斗争，他多数时间是睡大觉；也没有上书中央揭露林彪、“四人帮”的滔天罪行，他连想都没想过，更甭说写信了——他